

【经济与管理】

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与长期经济增长

沈恒林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04)

摘要: 运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消费与储蓄理论, 分析了导致中国近年来居民消费行为变动的因素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并据此提出刺激居民消费持续增长的对策。

关键词: 消费行为; 长期经济增长; 预防性储蓄; 社会稳定机制

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Consuming Behavior of Chinese Citizens and Long-term Economic Increases in China

SHEN Heng-lin

(College of Arts & Law, Northeast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4, China)

Abstract By applying the consuming and deposit theory of modern macro-economics, the main factors which lead to the changes of Chinese citizens' consuming behavior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great impact they have had on the long-term economic increase are analyzed. Meanwhile, some feasible policies to stimulate the steady increase of consumption are presented.

Key words consuming behavior; long-term economic increases; precautionary savings; mechanism of social steady

自1997年中国发生通货紧缩以来,国家为启动内需连续几年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还加大房改力度和对一些行业实施了压产限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民间投资和住房需求的上升,逐渐使经济走出了不景气的泥潭。然而,国家虽实施如此大的调控力度,除住房需求外并未明显地带动起居民消费的上升,这不能不给中国长期经济增长蒙上一层阴影。中国居民消费约占国民收入的60%左右,在社会需求中居于主体地位,同时消费需求还通过其与投资需求的互动关系起着诱导投资需求的作用。所以,启动并保持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就成为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环节。中国居民历来有节俭传统,加之转轨时期就业与收入不稳定程度的增加,更增强了人们尽可能地减少现期消费,增加储蓄以备后患的观念。鉴于此种情况,在改革与发展策略的选择中,只有将改革的措施与发展的策略相契合,方可绕过不景气的泥潭,推动经济

长期持续地增长。本文以分析消费需求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为出发点,着重阐释转轨时期居民消费行为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激励居民长期消费行为的对策。

一、消费需求与长期经济增长

现代宏观经济学把开放条件下的社会总需求分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需求及净出口四个部分,认为由这四部分构成的总需求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决定了一国国民收入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就大国经济而言,国民收入长期持续增长不可能主要依靠净出口和政府需求的无限制增长来实现。因为长期内,一国进出口总额总是平衡的,大量出口总要通过进口来填补,同时过量出超不仅可能导致国际贸易争端,并且对国内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不利的;而政府需求的持续扩张,必然伴随着税收的增加,导致企业利润的下降,从而影响民间投

资和居民消费的增加,降低宏观经济运行的效率。因此,大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应主要源自民间投资与消费增长的拉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民间投资与消费需求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关系:民间自发投资的增加往往是在消费回升、市场转旺诱导下发生的;民间投资的增长可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而消费的上升,可以造成市场的繁荣,进一步刺激投资的增加。显然,在这种互动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投资需求,而是消费需求。由此可以认为,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最终源于消费需求的增长。

经济增长最终源于消费需求增长的判断,可以由宏观经济学的乘数原理得到支持。乘数原理是关于社会支出或需求的增加而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长的倍数的理论。其公式是:

$$\Delta Y = 1/(1-C)\Delta A$$

式中: ΔA 为某一部门支出或需求的增加量; C 为边际消费倾向(增加的消费与增加的收入的比); $1/(1-C)$ 即为乘数,而 ΔY 则为某一部门支出增长引起其它部门支出增长而最终增加的国民收入。上述公式表明,国民收入的增加量取决于乘数的大小,而乘数的大小则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 C 。因此,边际消费倾向越大,乘数越大,国民收入的增加量也就越大;边际消费倾向越小,乘数越小,国民收入的增加量也就越小。

提高消费的比率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消费率的提高则会降低储蓄倾向,导致投资率的下降。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率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投资率的大小取决于储蓄倾向的高低,储蓄倾向又与消费倾向呈负相关。可见,过低或过高的消费倾向都不利于经济增长。所以,经济增长的最佳状态应是适度的消费率与适度的投资率的结合。然而,中国目前的情况是,消费倾向过低,而储蓄倾向过高,并且由于消费市场的低靡,企业与个人投资意愿不强,相当一部分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适当措施刺激消费,转市场滞销为旺销,则可以吸引社会各方面的投资,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回升。

虽然在长期内刺激消费可能降低投资率,但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投资并非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除资本投资外,技术进步、知识的积累、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也对经济增长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在采取措施刺激消费的同时,加大对科技、教育、卫生等领域的投入,也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有

效措施

二、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所谓居民消费行为是指居民在支配收入和选择消费中的一系列行为的总和。一般说来,一个人在获得一定量收入后,总是将收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购买消费品和劳务,以实现现期的消费;另一部分用于储蓄,以便未来的消费保持相对的稳定。影响消费倾向与储蓄倾向变动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是现期可支配收入及其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这是影响消费倾向的首要因素。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一种函数关系: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支出已随之增加;反之则减少。如果对未来收入预期良好,消费倾向就会上升;反之则会下降。其次是就业的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稳定的就业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稳定现期与未来的收入,改善人们对未来消费的预期,从而大大提高消费率并降低储蓄的相对量。再次是消费信贷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以及流动性约束的大小。消费信贷在消费中作用的增强,抑或采用多种金融工具加快居民各种财产形态的转换,都有利于提高人们消费的相对量。除了上述因素外,受制度、种族、宗教、习俗等因素制约的习惯和偏好也与消费倾向呈直接相关作用^[1]。欧美民族历史上属于游牧民族,加之他们长期受天主教伦理道德的影响,财富积累的观念相对淡薄,因而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和较低的储蓄倾向。东亚各民族特别是中国居民大多由农耕民族演进而来,长期的定居生活以及儒家文化对节俭的倡导,使人们生成了很强的节俭传统和财富积累的观念,因而具有较低的消费倾向和较高的储蓄倾向。通常地说,节俭可以增进资本的积累,推进长期经济增长。但是,当制度环境与收入处于不稳定状态时,这种传统与观念则会得到大大地强化,从而形成宏观经济运行的陷阱。

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正验证了上述判断。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国家对企业的产权制度、用工制度、分配制度、福利制度以及宏观调控、市场体系、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改革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不能不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首先,随着公司化改制,兼并、破产、下岗分流、减人增效等措施的实施,造成了大量职工下岗失业,传统的固定工制度事实上已被取消,代之而来的是流动性极大的合同

工制度。就业的不稳定造成了收入的不稳定,普遍恶化了人们对未来收入稳定的预期,大大增强了人们进行储蓄以备后患的动机。其次,传统的福利制度已被取消,过去由国家统包的医疗费和养老金改为由单位和个人通过缴纳保险金的办法解决,这对那些亏损和破产企业的职工已无保障可言。这些情况都不断给人们传递风险信息,使人们不得不采取自我保障的防范对策^[2]。再次,住房的商品化和公有住房由低租金改为向职工出售,大大增加了职工的开销。为此,他们不得不减少一般的消费,而竭力地增加储蓄。最后,近年来教育费用的急剧上升和毕业生就业难,在增加子女教育费用支出的同时,也使一些人不得不为后代生活的稳定积蓄财产。

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明显地带有预防性储蓄的特征。根据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人一生效用总和的最大化要求各期消费服从一个比较平稳的最优消费路径。但是,人一生各个时期的消费不可能是平稳的,有许多因素导致着消费的波动甚至大幅度下降,为此人们就要通过储蓄来平滑各期的消费和防范不测事件的发生。如果储蓄仅仅是为了平滑一生各期的消费,那仅仅是一般性的储蓄。如果储蓄主要用于防范由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而引起的消费水平的急剧下降,这种储蓄行为就可称为预防性储蓄^[3]。

预防性储蓄是西方学者于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分析消费者行为的理论框架。以后,虽然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模型,但由于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从而使这一理论一直处于不成熟的状态。预防性储蓄理论的研究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目前在西方并不存在这一研究的理论背景。从消费理论的角度讲,引致人们进行储蓄的主要动因源自个人风险和系统风险两个因素。所谓个人风险,是指一个人在一生中可能遇到的会对消费造成较大影响的各种事故如疾病、失业、灾害等。但由于这些事故是事前可以预见的,可以通过储蓄加以防范。由个人风险的存在引致的储蓄属于一般性储蓄,对其进行分析可归入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的理论框架。所谓系统风险,是指制度环境发生变化对个人消费造成的风险^[3]。制度环境的变化可以是基本制度的变化,也可以是具体制度、法律和基本政策的变化。制度环境变化的过程实质是对人们之间的基本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不能不对人们的收入与消费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而引致人们的消费行为的改变。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西方各国的制度环境一直处于

相对稳定状态,经济发展也较为平稳和迅速,加之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逐渐趋于完善,人们的收入在较长时期内稳定增长,因而除个别行业或个别职业,并不普遍存在预防性储蓄的动因。比较而言,近年来中国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和加快,各方面的体制急剧调整,影响收入与消费稳定的诸多因素都在发生变化,人们为了规避风险,不得不调整支出结构,尽可能地减少现期消费,扩大储蓄的比例,以增强抵御由各种不测事件发生造成的风险的能力。据统计,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已由1982年的92%降到1999年的72%,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也由1982年的93%降到1999年的82%。与此相适应,近年来居民储蓄存款总额则急剧上升,已由1990年的7034.2亿元上升到2000年末的68000亿元。

把中国居民的储蓄行为归为预防性储蓄的范畴,不仅为这一理论的完善提供了可信的证据,也为改革与发展策略的调整提供了依据。有人认为,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是暂时的,是一时不能适应制度环境变化的非理性行为。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笔者认为,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不是短期的和非理性的,而是被动地适应制度变迁的理性表现。目前,虽然中国新体制的框架已初现端倪,但仍很不完善,许多方面仍存在着大量不可预测的因素。消费者作为理性的行为人,只能依据已知的和可预测的因素而不可能依据不可预知的因素来决定自己的消费行为。由改革不到位引起的消费萎缩只能通过加快推进改革的办法得到解决。所以,在推进企业改制的同时,必须加紧建立能够促使居民就业与收入平稳增长的社会稳定机制,才能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强劲持久的动力。

三、构建激励居民长期消费行为的社会稳定机制

为了激励居民的长期消费行为,必须建立社会稳定机制。社会稳定机制是通过制度的创新和政策的选择而形成有利于促进就业与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建立社会稳定机制,既可以增强消费者的信心,推进消费的持续增长,又可以稳定民心,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构建社会稳定机制,包括稳定和提高就业水平,建立完善可靠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适当的货币、财政和收入调节政策等内容。

建立完善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稳定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善人们对未来乃至一生

的消费预期,大大提高消费水平并降低储蓄的相对量,在长期内对刺激消费具有决定作用。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伴随着基本经济关系的调整,居民就业和社会保障水平暂时处于不稳定或下降状态是难以避免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目标的逐步实现,国家应尽快通过实施适当的政策措施来促进就业的稳定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第一,运用立法的方式,普遍推行合同用工制度,对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确而又严格的界定,将职工的雇用与解雇都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以维护劳资双方的权益,惩治那些在用工过程中出现的欺诈、违法和过于随意的行为,以促进就业的稳定。

第二,通过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强制地在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组建工会,并重新界定工会的性质和地位。根据中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和经济体制的实际变化,可将工会界定为在党的领导和地方政府的指导下,独立于企业或资方并能与之相互制约的群众性职工组织。这样,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劳资双方力量失衡的状态,使职工能够通过工会就用工、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有组织地与资方谈判,以切实有效的维护职工的权益。

第三,实行激励性的就业政策,对能够大量增加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应在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适当的优惠,以促进就业的扩大。对刚处于起步阶段的自谋职业的下岗职工和待业青年应实行特殊优惠的鼓励和扶持政策,以便他们初创的事业能够获得成功。

第四,在城镇中强制推行失业、医疗和养老保险,在农村鼓励这些措施的推行,同时规范社会救济和扶贫的方式,提高城镇居民最低收入与工资标准,使全社会普遍享有稳定可靠的社会保障。对于那些因破产或减人增效措施的实施而失业的国有企业职工,国家必须实行适当的补偿政策。补偿金可依据工龄和实际贡献计算,但必须将其纳入社会保险序列,使这些职工在得到一定保障的同时,能够激励他们重新就业。此外,国家每年应从财政收入中拨出适量资金,补贴给承担社会保险项目的保险机构,以激励他们的积极性,并有效地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

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刺激居民的消费具有积极作用。增加货币的供应量,适当地降低利率,不仅可以带动投资的上升,提高就业和收入水平,降低储蓄率,拉动消费的上升,还可以调节分配关系,促进社会公平。但是,利率的调整一定要适度。如果将利率调得过低,不仅使货币政策失去回旋余地,并刺激股市过热,还可能导致储蓄率不降反升。因为随着收入的增长和风险预期的增强,许多居民不再将一部分储蓄作为延期的消费,而是将其作为生利的财产来对待,被纳入未来消费稳定的基础。在现代经济学中,利率被视为资金的价格,利率的降低意味着财产的贬值,当人们意识到已有的储蓄已不足以实现未来消费的稳定,就可能采取加大储蓄量的办法来抵消因利率下降而带来的风险。有学者认为,利率的变化是否影响储蓄,关键看利率的变化是否以及怎样影响了财富价值和财富收益的变化;如果利率的下调引起了财富价值和财富收益总体的下降,则可能引起储蓄率的上升^[4]。

建立社会稳定机制只是从体制与政策上为消费的增长提供了可能,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需要工商企业为消费者提供具有足够吸引力的商品和服务。为此,企业在加强经营管理,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的同时,必须转变经营理念,拓宽经营思路,多在产品与服务的吸引力和趣味性上下功夫,就一定有效地拉动起消费的回升。要知道,追逐新奇和时尚几乎是所有消费者的共有偏好,如果商家能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时尚,将会收到意外的效果。

参考文献:

- [1] 刘建国.中国农户消费倾向偏低的原因分析[J].经济研究,1999.
- [2] 张平.消费者行为的统计检验、制度解释和宏观效果分析[J].经济研究,1997,(2).
- [3] 朱春燕.预防性储蓄理论[J].经济研究,2001,(1).
- [4] 李焰.关于利率与中国居民储蓄关系的探讨[J].经济研究,1999,(11).